

高职教育通讯

2014 年第 12 期 总第 58 期

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教育研究所编 2014 年 09 月 15 日

本期目录

【高职要闻】

- 柴葳: 教师节设立 30 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成就综述·····(1)

【综合资讯】

- 禹跃昆: 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现状调查····· (7)
- 若尘: 对高职“零投档”现象绝不能反应迟钝 ····· (14)

【职校之星】

- 王晨 王烁: 张家群: 兴趣加奋斗好运自然来····· (16)

教师节设立 30 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成就综述

记者 柴葳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无疑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战役。30 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出新招、解难题、开新局，教师队伍建设的成效日益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则是名副其实的奠基者。如何建设好这支世界最大规模的教师队伍，事关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全局，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教师节致全国广大教师的慰问信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

从 1985 年设立教师节至今的 30 年间，党和国家始终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始终关心教师的健康成长，始终发挥教师在我国教育事业中的作用。2010 年颁布实施的教育规划纲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对广大教师提出殷切希望和根本要求。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无疑是一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战役。30 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出新招、解难题、开新局，教师队伍建设的成效日益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夯实根基，铸牢教师队伍“大本营”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清晰地记得，1985 年 9 月 10 日，中央有关领导参加的开学典礼正在北师大操场上举行。“当天，我们教育系 84 级（1）班的 4 名同学，打出了‘教师万岁’四个大字，表达对教师的敬仰和向全社会呼唤尊重教师职业的心声。”吴霓说，当时他们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尊师重教的传统，随着教师节的设立又回来了。1985 年 11 月，原国家教委召开全国中小学师资工作会议，强调大力改革和加强各级师范教育，普遍推行提前招生、定向招生和培养制度。“教师节的设立具有极明显和重要的象征与导向意义，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地位，更有利于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说。

在教师节设立 10 年后，教师教育成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个发力点。1996 年 9 月，原国家教委在第五次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把师范教育作为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措施，优先发展，适度超前”。1999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鼓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培养、培训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探索在有条件的综合性高等学校试办师范学院。”

此后 10 年，我国的教师教育经历了从结构调整开始的飓风式发展变革，直至 2007 年 5 月，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在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现代教师教育体系下，教师教育体系更加开放，更加趋向一体化。在从中师、大专和本科的“旧三级”向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新三级”转变的过程中，从 1999 年到 2013 年，我国本科师范院校由 87 所增加到 113 所，专科师范院校由 140 所减少到 55 所，中

等师范学校由 815 所减少到 110 所，高师毕业生和中师毕业生之比从 1999 年的 38.4：61.6 提高到 2013 年的 89.7：10.3，师范毕业生学历层次显著提高，以师范院校为主体、综合性院校积极参与的现代教师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教师教育在教师队伍建设中起到研究教师专业发展趋势和出现的问题，并通过不断寻求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法，科学提升教师专业发展，从而保障教师质量持续提升的作用。”吴霓认为，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顺应了教师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2012 年 9 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教师工作会议，会前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葛明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文件将高校中青年教师的专业发展作为重点推进内容，不仅提供指导思想，还列出了具体的措施和途径，这在国务院的文件中是不多见的。”

事实印证了葛明贵的判断。同年 11 月，教育部联合相关部委分别出台了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前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改革等 6 个配套文件，着力解决各级各类教师队伍存在的瓶颈问题和突出矛盾，教师队伍建设由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教师专业成长和师德建设“两条腿”走路，是 30 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明确思路。每年教师节，全国上下对优秀教师的集中表彰正是师德建设成果的彰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先后 4 次颁布中小学职业道德规范，实现师德建设政策体系全覆盖。近年来，师德建设制度体系更是不断完善。

补齐短板，提振农村教育“精气神”

一直被生源减少、师资老化困扰的湖北省广水市蔡河镇中心中学校长汪国，脸上终于有了轻松的笑容。2012 年 3 月，湖北省省级统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队伍补充新机制正式启动，政府给钱配教师，农村校只管使用，让不少农村校长精神为之一振。

其实，像湖北这样着力补齐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短板，可以说是 30 年来教师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我国 80% 的教师在农村，针对农村师资底子薄、结构不合理等困扰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性难题，国家确立了着力破解薄弱环节和热点难点问题，分类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路。

设立教师节后的 10 年里，补短板的努力更多体现在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上。1985 年的改革，明确中小学教师加发教龄津贴，并将工资标准提高 10%；1993 年的改革，设立课时津贴，大力保障教师工资按时发放。

1990 年，苏州振华中学副校长袁卫星曾在农村中学任教。“当年我和我夫人两个教师，一年工资买不上一台彩电。因为待遇低，不少教师辞职下海了，我也曾动摇过。后来教师的地位待遇得到了保证。”袁卫星说。

正如袁卫星所经历的那样，以提升教师待遇来改善农村教师发展环境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2006 年，各级各类学校建立了岗位绩效工资制度。2008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率先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制度，到 2010 年第二季度，全国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奖励性部分已经覆盖了在职人员 1051 万人、退休人员 382 万人。

30 年来，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增长了 43 倍。据 2010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全国教育行业平均工资多年来首次高于国家机关，总体实现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2011 年启动的边远艰苦地区农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规划，2013 年实施的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更是锦上添花。

“现在农村教师待遇比城里教师还高，学校条件也好，大家都不愿调入城里！”江苏省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校长万国华说。在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下，如何弥合城乡教师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真正让农村教师“引得来、留得住”？党中央、国务院想得更多，做得也更多——

2004 年实施的农村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吸引了 8881 名优秀应届本科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农村学校任教；

2006 年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等四部委联合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已累计招聘特岗教师 43.2 万人，覆盖中西部 1000 多个县，3 万多所农村学校；

2007 年—2013 年，6 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共招收 7.2 万名免费师范生，其中 4.5 万名毕业生中有 90.8%到中西部中小学任教；全国 22 个省份开展的地方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每年约有 3 万名师范生和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2010 年启动实施“国培计划”，重点对中西部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进行培训。截至 2013 年，累计培训教师 493 万人，其中农村教师占 95.9%；

2012 年，财政部、教育部启动实施的“中西部农村偏远地区学前教育巡回支教试点工作”的试点省份已达 14 个，共在 63 个县设置支教点 3521 个，累计招募志愿者 7081 人次；

2014 年 8 月，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力争用 3 至 5 年时间实现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

锐意改革，规划教师队伍成长“阶梯”

“我有幸在 41 岁的时候成为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职称制度，我的专业发展道路才能越走越远。”袁卫星认为，职称制度改革实质是对教师专业化程度的评定。

纵观 30 年来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改革进程，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晰，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专业标准越来越细化。

其实，从 1986 年中央职称领导小组首次将中小学教师纳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管理起，我国就开始了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探索。进入新世纪，从 2009 年国务院启动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到 2011 年教育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扩大到 31 个省份 104 个地级市，一项改革牵动了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心，也悄然改变着他们的命运。截至 2013 年，30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09 个地级市首次评出 806 名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违规违法行为被媒体披露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通过提高教师准入门槛，加快教师资格制度改革，从源头杜绝这种现象，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曾作为主持者之一参加了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及《考试大纲》的研制与命题工作的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惠中认为，教师资格制度是教师职业的准入制度。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我国教师队伍由数量补充向内涵提升转型，以往的教师资格制度存在教师资格认定学历要求偏低、认定标准和程序不严格、资格证书终身制等弊端逐渐凸显。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世纪之交，《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的相继出台及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为教师资格制度的改革做了扎实的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和实践环境的准备。2011 年至 2012 年，教育部在浙江、湖北等 6 个省组织开展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试点，率先完成国家教改重点项目，2013 年扩大到 10 个省份，争取到 2015 年在全国范围推广此项制度。

新一轮教师资格制度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提高教师职业的准入门槛。在 10 个试点省份组织的 6 次全国性的教师资格考试中，笔试累计通过率仅为 35.1%。五年一周期的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也打破了教师资格终身制，完善了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质量关系教育质量和育人质量，通过推行教师资格制度，把好教师职业入口关，是质量保障的前提。”吴霓认为，教育质量是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样教师的职业发展也是一个过程，需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标准体系进行过程控制。2011 年以来，教育部首次颁布实施了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师、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以及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目前，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已完成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工作。2012 年，教育部系统设计了由 84 个标准或规范组成的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师队伍建设标准体系。

力促发展，建设教师发展“高速路”

一位来自山东德州的农村教师写下的远程研修感悟，曾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多少年了，我想从这个枯井里出来，看看外面的蓝天，但是喊了半天，却没有一个人来拉我一把！今天，总算如愿以偿。”

程方平坦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对象的变化，每位教师都要在课程专业和教育教学两方面不断应对挑战、与时俱进、提高自身的素养，教师的专业发展似乎是没有终点的历史进程。

其实，早在 1989 年，原国家教委便颁布了《关于加强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意见》，启动“百万中小学校长培训工程”，专门成立了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据统计，20 多年来，通过开展入职培训、提高培训、专题培训和高级研修等，共有中小学校长 18.1 万人次参加国家级培训。

细心梳理一下 30 年来我国教师培训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从“普及”到“专业”的显著发展趋势。进入新世纪，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标志着教师培训进入到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重点的新阶段，明确参加培训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教师培训实行每五年为一个周期的管理制度。

2010 年，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教育发展重大项目——“国培计划”，以满足教师专业发展的需求为主要目标，积极探索创新培训模式，4 年来共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493 万人，到 2014 年底将完成对 640 多万中西部农村教师的新

一轮培训。在“国培计划”的示范带动下，软件建设上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教师长期得不到高质量培训的情况得以扭转。

与此同时，职教“双师型”教师培训体系日趋完善。2006年以来，教育部、财政部先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能力提升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组织60多万名骨干教师和校长参加培训，基本形成专门化的教师培训课程和教材体系。高校教师培训力度不断加大，《高等学校教师培训规程》、《关于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文件相继出台，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通过研修培训、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逐渐在专业发展上崭露头角。

如果说专业培训让教师走上了专业成长的“高速路”，教育信息化的深层次推进无疑为这条道路插上了翅膀。2005年教育部启动了“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2013年又启动了“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3日第1版）

我国高职院校“走出去”现状调查

记者 禹跃昆

■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建设国际化的高职专业队伍，迫在眉睫。

■ 我国高职院校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应该更多与国际接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亟需建立。

■ 高职“走出去”要讲究竞争策略，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我国高职院校应进行准确定位，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分步、分类、分项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

■ 理解国际合作办学的意义至关重要，要将其看作一条鲑鱼，使其激活高职院校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开学在即，高职院校迎来新生。一些院校的新生中，不乏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面孔，其背后正是近年来中国高职招生逐渐发生的变化。

就在不久前的录取工作中，一种现象普遍存在，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与国内生源萎缩的“冰”相比，国外生源却呈现火热的一面。“2012年职业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项目有633个，占整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46%，可见

几乎差不多有一半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7月2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解读刚刚闭幕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说。

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通过开展“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项目建设等改革举措，有力提升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走出去”正当其时。

然而，我们又看到，在当前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中，也有杂乱之声，有时甚至会走弯路。面对国内生存危机和国外一流高职院校竞争的双重夹击，我国的高职院校如何调整步伐才能走出“国际范儿”，提高国际化办学水平？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调查。

师资国际化是核心也是短板

“缅甸的职业院校有多少所？”

“不知道。”

“缅甸的职业教育学生人数有多少？”

“不知道。”

“缅甸的留学生规模有多大？”

“不知道。”

这是近日记者跟随某高职院校代表团去缅甸招收留学生时，与一位高职院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的聊天记录。

作为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人员，理应对目的国的情况有所了解。而这种反常的情况，在一些高职院校国际交流合作部门的工作人员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这位院长向记者坦言：“我也是半路出家，因为在二级学院的所有干部中，我的英语略微好些，就来当院长了。”记者还了解到，相比这位院长所在的学校，代表团的一些院校没有专门的国际教育学院，只有外事处。

“面对全球进行招生，我们显得有点力不从心。”江苏一所职院的外事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个外事办只有四个人，一个主任和一个副主任，还有两个职员。有很多去国外招生的宣讲会，我们都不敢出去。一出去，就会积压一大堆行政事务，所以招生只能是个‘副业’，对它真是又爱又怕。”

在接下来的与缅甸高职院校的合作洽谈会上，记者看到，一些院长不会讲英语，全凭自己带来的专职翻译进行沟通。“懂专业的不懂英语，懂英语的不懂专业。”一场洽谈会下来，有的人只是混了个脸熟。

“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是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一个瓶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与继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对记者说，在全球化进一步加速的背景下，我国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急需既懂“专业技术与外语”又“通晓行业国际规则”的人才。

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共选派了 7000 多名职业学校的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个数字的取得已属不易，但对于正在不断加速的高职院校“走出去”的步伐而言，还是显得有些不足。记者在清华大学网页上查询到，该校 2009 年一年的出访师生人数就达到了 6000 余人。

建设一支国际化的高职专业队伍，已迫在眉睫。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对外开放的要求，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教师的国际化是高职‘走出去’的一个核心问题。”孙诚说，可以在高职教师培训方面，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例如建立“教授海外进修假”制度，规定学院现职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可有半年或一年的进修假，其间，至少有一个季度赴国外大学交流进修；同时，让新聘教师进行海外访学，规定对获得硕士以上学位或行业较高级别认证的新聘教师，在其来校工作满 3 年后公派出国进修。没有条件的，最起码可以规定每个专业每年至少聘请一名外籍教师进行一次专业讲座。

质量标准和评估机制有待与国际接轨

最近，老挝导游郑女士有点烦，因为她的女儿在中国并没有学好汉语。

“现在在老挝，如果你拥有一口流利的汉语，会找到很好的工作。”郑女士说，所以去年她把女儿送到云南的一所职院去学习汉语。

然而，一年下来，女儿的汉语并没有学好。无奈之下，她决定让女儿退学，准备下半年把女儿送到新加坡的学校去学习汉语。“听说那边的教学要严格得多，能够真正掌握流利的汉语。”

郑女士的烦恼，体现了当前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质量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国内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国际合作办学，更多只是追求了“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忽视了“实质上”的国际化。

西部一所职院的外办副主任告诉记者，很多高职院校师资的国际化水平较差，最基本的英文教学可能都达不到，而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理念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应试式、填鸭式的，根本没有与国际接轨。

除了师资水平，专业设置也存在问题。《2009 年中国大学指南》显示：高职院校的中外联合办学专业中，财经类、旅游类、管理类等文科专业超过合作专业总数的 70%，而农、林、牧、渔等理工类专业不到专业总数的 30%，动漫、数控等高技术专业更少。普通专业设置过多，没有体现高职特色，热门专业过多，没有体现地方特色及学校特色。

“职教国际办学的专业设置，要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南京工业职院质量监控与评估处处长周玉泉告诉记者，此外高职专业设置与本科专业设置应该有所区别。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该与本科院校错位发展、共同发展。

“在保障办学质量的过程中，评估往往会成为控制质量的有效手段。”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外事办公室乔峰指出，因此，要做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监控工作，首先应该从项目招生开始，在师资聘请、教学组织等教育实施的各个环节建立起适合高职院校特点的质量标准。其次就是应该建立具有独立性、公正性、系统性和权威性的质量评估机制。

教育部于 2011 年 7 月决定全面实施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质量评估，但对于高职教育的国际合作办学项目而言，仍没有相应的专门举措，宏观上只是靠国家和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备案管理和检查，以及涉外教育监管网的信息发布。合作办学项目质量参差不齐，政府缺乏有力的外部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在建立质量评估机制方面，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些成熟做法。例如，在学校外部建立诸如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EQC）、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局（AUQA）这类机构，来对学校整体的教育质量以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教育质量进行监管和评价；在学校内部，也应该设立合作办学项目质量监控部门，严格依据合同协议，加强对合同协议所规定具体条款实施过程的日常监控。

“走出去”要有统筹规划避免无序竞争

记者近日在参加一场中国高职海外招生洽谈会时，看到了一些不“融洽”的场面：两所中国的高职院校为了争取一所国外职院的生源，竞相给出各自的优惠条件。“你给半额奖学金，我给全额奖学金。”一来二往，这所国外的院校还没有开口，已经拿到了中国高职院校能给的最大优惠条件。

“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走出去’的时机和方式。”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王宏海告诉记者，不能一哄而上、无序竞争，否则将是一盘散沙。

“当前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多为学校自发组织。”湖北工业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梦卿指出，在合作对象的选择及合作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以专业领域划分或者以地域特色划分的国际高职院校信息库。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锡耀则更系统地提出，我国的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三分而后行”，即分步、分类、分项实施。

分步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拍脑袋就出来的，而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团队，做好国情调研，研究对方国家的需求，列出清单，最后制定出规划。

分类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有专业划分。不要全面开花，应该按照每个学院的特色专业来错位招生，否则会陷入恶性竞争。

分项实施指的是，“走出去”要细化项目，例如留学生、教师、校长等多方位地“走出去”，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项目。

记者跟随国内高职院校赴缅甸招生期间，参观了多所缅甸的高水平技术学院，其中很多都是日本、德国等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直接援建的。

“出国后才发现，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校企合作推动国际办学方面的差距有多大。”周玉泉说，我国高职院校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借船出海，在学生培养、课程设置、硬件建设等多方面与中国的跨国企业合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海外办学的成功率，大大促进我国高职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要探索和规范中国职业学校到国（境）外办学。”葛道凯在解读全国职教工作会精神时指出，“为什么要到境外办学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企业走出去的越来越多，中国产品走出去的越来越多，我们要发展和中国企业以及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使我们的国际市场能够更加巩固，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更大的发展潜力。”

而谈到在国际职教市场上，如何与德、日、美等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开展竞争时，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规划与科研处处长、副研究员罗尧成指出，可以利用我国的语言和学科特色，在较发达国家教育市场上争取以“补缺者”角色输出我国的职业教育；而针对其他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教育市场，则可以利用我国在制造业、制造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中的相对优势积极开拓教育项目。

借国际合作办学激活高职教育改革

对于常德职业技术学院黄副院长而言，申请招收外国留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008 年，当刚从国外考察回来的他，抱着材料去省教育厅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得到的回答是：“本科招收留学生就行了，高职院校还招什么留学生啊。”

经过该学院 5 年多不懈的“个人”努力，终于在 2013 年经省教育厅审核批准，可以招收留学生了。

与黄院长相比，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外办副主任唐现文则要幸福得多：“我们当初申请招收留学生时很简单，就是去省教育厅备下案就可以了。”

审批制与备案制的差别，体现的是对高职院校“走出去”的不同理解。而这种理解上的不同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别。

一位职业院校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向记者介绍，我国从 2006 年至 2010 年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在此基础上，我国教育部于 2010 年，在原有已建设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的基础上，新增 100 所左右国家骨干高职院校，以此继续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

“与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不同的是，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内容中，明确引入了‘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内容。”这位院长说，不管质量如何，反正得把国际合作办学开展起来，先把国家骨干高职院校的验收通过再说。

同在江苏，一所职业院校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则向记者倒起了苦水：“国际合作办学对于我院而言，就是一个鸡肋，院领导不重视，投入很少，而很多学院也认为我们是在给他们找麻烦。”

而在另外一些职院，则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唐现文说：“国际合作办学，对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有一种倒逼作用。这要求我们的工作更加细化。比如，来自印尼的留学生多数讲英语并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我校从教育教学，到食宿管理等方面，都要做有针对性的改变。”

“国际合作办学，就像是一条鲇鱼，它能激活各个学院的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文化建设、后勤服务等方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杨艳说得更形象，生源也是一个大问题。通过对国际生源的抢夺，才能对目前的高职院校进行洗牌。

“高职院校‘走出去’还处于摸索阶段，一切都在探索当中，有很多不确定性。”孙诚说，但是有一条是确定的，那就是不走这条路，高职院校肯定是无路可走。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5日第5版）

【链接】

我国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初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开始萌芽。1983年，由国家教委牵头，南京市教育局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建设了南京建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现更名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办三年制中职和五年制高职学历教育，从此拉开了中国与外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序幕，为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奠定了基础。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举办联合课程，成为我国高职教育领域首例跨国分段式合作办学的个案。随着1995年《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沿海城市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逐步兴起。这一时期，高职院校中外合作办学处于尝试探索的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在高职业院校中外合作办学中起着主导和引领的作用，民间自主探索相对较少，合作办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开放城市，办学模式多为松散型。

我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以来，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办学越来越多。据教育部2002年年底统计，经教育部门审核批准的全国中外合作项目有712个，其中学历教育项目有372个，非学历教育项目有313个，幼儿园项目有27个，在学历教育项目中，中职和高职占了50.27%，非学历教育项目中也有大量属于职业教育范畴。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之后，高职院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了较快发展。地方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教育也越来越多，2008年年底，浙江省已有高职中外合作项目32个，当年招生1572人。2009年年底，江苏省报教育部审批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404个，为全国第一，其中高等学历学位教育338项（研究生层次14项，本科层次94项，专科层次230项）。

（资料来源：赵双兰 李梦卿《我国高职院校国际合作办学教育发展研究》）

对高职“零投档”现象绝不能反应迟钝

若 尘

今年高职高专录取已经完成，据陕西省 201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高职（专科）正式投档情况的统计数据显示，有 320 所院校在该省遭遇“零投档”。这种现象不单单出现在陕西，安徽、贵州、海南等都有相当数量的高职高专院校遭遇“零投档”。（《中国青年报》8 月 25 日）

高职遭遇“零投档”的确不是什么新话题，今年大面积发生的“零投档”确实是个新现象，本该引起足够重视，但即使是在职教圈内，反映也不一：有人认为，这些仅仅是一连串数字，不过表明高职遭遇“零投档”的常态化，不足以说明实质问题；有人觉得“零投档”主要出现在省外招生，媒体有放大之嫌，毕竟，自己所在的省份和学校今年总体招生还不错，不必如此悲观；还有人对“零投档”早已产生审美疲劳，对此视而不见，以为危机不过是报章上渲染出来的，离自己很遥远，是新闻从业者吸引眼球的“标题党”罢了……

必须承认，我们都会带着先见看待高职遭遇“零投档”现象，每个人的视野都会受到所掌握的信息、处在的岗位、承担的责任等因素限制。据 2013 年教育部备案的数据显示，全国有 1266 所高职院校，可谓良莠不齐，国家示范及骨干高职院校招揽生源，具有绝对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暂时高枕无忧，尚且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处于二、三线城市中一般的高职学校无疑首当其冲，这种“无米下锅”的焦躁，生源尚可的院校根本无法体味。

近些年，生源危机是个不争的事实，其愈演愈烈之势，已然超出我们的估计：据有关测算，我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规模于 2008 年达到峰值，随后至 2020 年前后逐年下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免费，中职毕业生规模扩大，适龄人口高考报名人数下降；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中放弃高考人数逐年增加；国外高校加大在中国的招生力度，港澳地区高校介入内地揽才，高中生自主选择权增加……高等教育正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谁的手里都不会握有一把“尚方宝剑”。

汉语中，“危机”是指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考验决策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刻，是人生、团体和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零投档”危机恐怕正是高职院校面临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考验的也正是管理者们的决策能力。

1980年代，美国高校也经历了一场高校“大洗牌”的过程。作为一所历史超过百年的私立4年制大学，美国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受益于生源增加的大环境，曾在1970~1980年经历了规模的快速扩张。但当1981年在校生数量达到顶峰之后，申请和入学的人数出现了急剧下降——1979~1983年的4年间，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30%，学校的生存危机一夜之间找上门来。时任学校教学副校长的帕翠西娅·尤尔思（Patricia Ewers）领导了一场拯救行动，经过两年努力，学校最终止住新生数量下滑趋势，走出了危机。回顾这一过程，校长这样描述：“如果学校能够在新生数量开始下降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成功的机会就增大，总的成本就会得到更好的控制。”

毋庸置疑，危急时刻，需要前瞻性，需要胆识，需要魄力，更需要有效的策略，反应速度过慢者将会作茧自缚，行动迅速者则会日益壮大。须知，意识到危机的前提，是要具备充分的自知之明。笔者担心的是，一些高职院校的管理者会对形势认识不清，总以为情况并没有那么坏，对现实作出误判，总是处于被动状态，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政策救助”上，这无疑是危险的。

这些年，一些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确实施了各类举措，比如注册入学、专业预警、分类招考等，但行政包办并非万能，结果也非卓有成效。相关举措不仅给公众带来误解，也导致一些公办院校对上级主管部门和政策的过分依赖，行政一旦放手，这些“家养”的院校没有野生的能力，恐怕缺乏独立应对危机的灵活性。

当然，取得成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革也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代价。职教歧视这个“痼疾”在社会上还会长久地存在，但高职院校绝不能坐以待毙，巴望着等到社会环境彻底变好后才去寻找出路。相反，高职院校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动出击，广泛调研，了解招生中的不足，明晰自身的竞争优势；组织全体教职员工，加强培训和学习，增强危机意识，转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慵懒作风，勇于担当；结合社会需求，谋求企业合作，整合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特色品牌；调整组织机构，避免人浮于事，提高院校管理效率，提升招生的科学性和专业水准。

“零投档”有如在高职院校的队列中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对部分高职院校来说是场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些尚处于“零投档”边缘、并无竞争优势的院校是时候快速作出反应了，任何拒绝变革、满足于现状者都是在自掘坟墓，必遭市场淘汰。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1日）

张家群：兴趣加奋斗好运自然来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王烁

张家群永远也忘不掉接到获奖通知的那一瞬间。“三个大男人根本控制不住眼泪，唰地一下就掉下来了，说夸张点，我好几年都没哭过了，那一刻真的是感觉四五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最大的回报。”

1990 年出生的大男孩张家群是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人。2012 年，还在大二在读的张家群及其团队，一举拿下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以下简称国赛）高职组汽车检测与维修（团体）一等奖。

刚上职校的张家群和其他男生一样，稚气未脱，有点贪玩。但对于专业课程，他却从来没有落下过。“也许男生天生对汽车感兴趣吧”。张家群高考填报志愿时，最终被大连汽车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第一次听说国赛，张家群更多是出于学知识才决定报名参加。学校最初通过海选留下 15 人，从中逐步淘汰才最终敲定决赛名额。于是，张家群跟着大伙，遵从学校严苛的军事化管理，早上 6 点钟出操跑步，晚上 10 点钟熄灯就寝，剩下的时间就是在理论培训的教室与实操操作的车间来回交替。前期感觉还没那么紧迫，中午还有休息时间，等到接近比赛日子，吃饭都练成几分钟的事了，吃完就马上回去训练。

“练手法真是难透了。”在学校，张家群所学的大部分是理论知识，很少接触实际的汽车检测与维修。而在国赛中，手法的灵活度是关键技能之一，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还要合乎标准，张家群为了攻克这关，可吃了不少苦头。大伙儿普遍都在这里卡了壳，指导老师用一种类似铁棍的工具，通过甩动重物的方式来练习大家的手腕力量。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枯燥艰难的训练过程，让很多学生纷纷离队，然而，张家群却坚持了下来。

就这样，凭借着自己的兴趣，再加上咬着牙坚持奋斗的劲儿，张家群最终入选代表学校参加国赛的团队。

国赛实行的是全封闭管理，同一天参赛的队伍基本都见不到面。如此严格的规则，让每位选手都沉浸在紧张的氛围中，而比赛中更多的是无可预知的状况。张家群的队友因为身体不适，在入场的最后一刻耽误了时间，

大家在最后的两分钟内才赶到现场，可能因为有点心急，比赛中出现过一个失误。当所有的项目按步骤完成之后，张家群突然发现操作过程中有一个过滤器的阀没有装，

于是大家拆下已经装好的零件重新又来一遍。很幸运的是团队依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操作。

比赛为期3天，在第三天晚上大伙儿都在焦急地等成绩，有些队员因为比赛中出现了失误，心情比较糟糕。带队的张院长没说一句责怪的话，带领着大家去吃了一顿很“正式”的饭。当大家以为与大赛冠军无缘时，幸福却来得很突然，让队员们猝不及防，每个人都喜极而泣。张家群始终微笑着，向记者描述那晚的情形。

带着荣誉回到母校的张家群，被学校聘为助理教师。工作了半年多的时间，张家群与老师和学生之间教学相长，结合比赛中的经验为同学们在提高理论知识的同时，增强了他们对实践的重视。

“比赛之后的我，似乎更成熟了，遇到什么事学会了冷静分析，不是盲目判断，也更让我意识到自己热爱汽车维修行业。”张家群认为，在学校里更多是偏重理论，理论固然重要，但需要与实践的结合才能提高得更快。他觉得自己学历有限，仅仅拿了一个奖就当老师，未免有点能力不足。

于是，张家群和家里人商量，辞去了学校里的这份工作。最初校长不让走，跟张家群谈了很多，但他去意已决。

如今的张家群，是大连天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从事汽车维修的工作。公司中修理工分三个等级，一级到三级，一级级别最低，张家群是一级员工。在他看来，通过这份工作可以逐渐练就过硬的技术，实践确实能带来技术上大的提升，而这是在学校学不到的。

张家群很满足现在的自己，从最低的位置一点点积累经验，对未来，他也有自己的打算：“最好干一段时间，我能自己开一个汽修店！”

张家群始终认为，赢得一场两场比赛没什么，就算成绩再好，也得靠自己的手艺一步步往前走。“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曾获得过什么荣誉，帮助你多少。如果坚持不懈地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我相信好运自然来。”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4年9月1日）